

总第002期  
2017年5月号

#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 本期要目

● 工作简讯

● 活动综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涵、路径及其他

● 专家观点

楼宇烈 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

党圣元 在创新中传承 在传承中创新

●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主 办：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顾 问：张岂之 郭立宏 王亚杰 张云翔

主 编：李 浩

执行主编：张海青

责任编辑：陈战峰 胡永杰 任雅芳 刘晓宇

● 工作简讯

##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成立



2017年3月4日,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西安举行。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5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界人士参加了仪式,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原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陕西省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共同为基地揭牌。

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系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牵头组建的专门性研究机构,2017年1月获批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由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教授兼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浩教授任首席专家。西北大学在文化人文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雄厚的实力,拥有众多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基地的成立意在会通校内各相关学科,打破学术壁垒,加强学术资源整合,形成一个高水平、汇聚多学科优势的学术平台。从而不断拓展创新与深化文化研究的方式与途径,揭示中华文化特别是陕西区域文化的基本理念、历史演变、表现形式与当代价值,努力为突显人文陕西、文明陕西的历史风貌与现代价值,促进陕西文化及其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外译与传播,为"三个陕西"建设增砖添瓦。

##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 基地举办“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 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3 月 4 日,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主办的“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研讨会”在西北大学举行,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数十位文化界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学者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内涵、意义、实施路径等问题,表达了各自的见解和看法。对陕西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具有的优势和重要地位进行了阐述发掘,对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的发展目标、思路、具体举措等献言献策,提出了多方面具有启发性的意见。

此次会议也受到了国内及陕西省重要媒体的高度关注,《陕西日报》2017 年 3 月 9 日第 15 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4 月 20 日第 8 版分别专版刊发题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涵、路径及其他》的文章,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及与会专家的部分重要观点。

##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西安市地税局 联合举办西安市地税系统“快乐地税” 文化专题研学班



为响应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探索高校中国文化学术研究资源面向当下、服务现实的途径,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西安市地税局联合举办了西安市地税系统“快乐地税”文化专题研学班。

研学班于2017年3月22日至3月24日在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西安市地税系统各基层局分管副局长、负责“快乐地税”建设的同志和市局机关各部门负责“快乐地税”建设的同志共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研学班设置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税务文化建设方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经济建设成效、税务管理干部的健康心理发展与压力调节方法、新媒体背景下新闻舆论格局与政府媒体关系管理等专题内容,邀请了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张茂泽教授、长沙税务干部学院刘绪义副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陈青苹教授、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隽教授等5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授。

研学班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参加培训人员普遍认为,通过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快乐地税”文化建设的认识更加清晰,理清了思路,收获颇丰。



##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第三届 “文明对话·长安论坛”



2017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第三届“文明对话·长安论坛”在西北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单位联合承办。

本次论坛系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推进的大背景下召开。论坛特邀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张岂之先生,著名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北京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先生为总顾问,并邀请了来自八个国家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外国学者十余人。西北大学等高校四百余名师生参加论坛,听取了报告。

论坛开幕式上,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西安市副市长、中国思想史专家方光华先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龚建忠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FLJ 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周小忠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李颖科教授,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顾彬先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安乐哲先生,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罗素·邓肯教授,西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胡宗峰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原副会长、陕西省翻译协会原主席安危先生等专家围绕“文明对话与命运共同体建设”主题,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东西文明互鉴与融合、“丝绸之路”与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地交流与探讨。本次论坛层次高,内容丰富,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 ● 活动综述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内涵、路径及其他

2017年3月4日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下简称“基地”)正式揭牌,并举行了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精神研讨会。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5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及媒体界人士就《意见》的内涵、意义、实施路径以及“基地”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意见。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涵及意义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意见》可以说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讲话中提炼总结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中央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的继承以及当下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路。《意见》的出台就是要建构适合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能改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能维系世道人心和社会秩序的、理性的、公正的、宽松的、和谐的新的道统、新的政统、新的文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统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可简称为“马统、中体、西用”。

我们不管谁思考当下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的问题,无疑都要面对三种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并存的格局其实早已形成,每一种都有它的社会存在基础。但是我们需要三者之间的贯通,还需要一个更高的体系,来把这三种文化统领起来。首先这三者之间要“通”,需要相互交通、沟通起来。过去我们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或出于革命的需要,或出于现实应用的需要,人为地造成了它们之间的阻隔,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相互的敌意。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以前当我们需要号召某些东西、批判某些东西的时候,就把传统拿出来,为现实服务,往往走上极端。现在我们要消除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阻隔,消除三种文化之间人为造成的相互敌意,让它们沟通、打通起来。然后还要“统”。怎么统,靠什么统领起来?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目的就是要把三种文化进一步地统领起来。

这样,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理论体系形成后,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就可能既保持敬畏传统文化、敬畏历史的态度,又同时能保持在文化思想上勇于创新的一种心态和姿态。这种要创立的体系,是既能充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同时又能与世界的先进文化相通相近、息息相通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及《意见》的出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重视方面第二次自觉,这种自觉最显著地体现在强调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意识,和以前相比,这是有了一个创新性

的发展的,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

方光华(西安市副市长)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文化自信,《意见》也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的目标。那么,增强文化自信该怎么做?我认为一个是干部的文化自信,一个是文化自信扎根到人民群众心中。首先要有领导干部的文化自信,这很关键。如果领导干部没有文化自信,那么社会的文化自信的深度广度就有问题。

陕西把干部文化自信的事情做好,是一个很关键的战略。目前我省还没有一个干部文化自信培训培养的平台,还没有一个和西安地位相称,有号召力、有感染力的为干部群众所亲近、所喜爱的品牌。西北大学“基地”成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当在这方面多承担责任,争取建设成为陕西省干部文化自信培训、培养的基地和平台。

迟宝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社长)

《意见》的出台体现了当下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空前重视和新的要求。国家要对整个社会文化建设施加影响,至少应该从活动、研究、保障三个方面展开,我们一般会习惯上从研究入手,但要注意国家和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研究要求的新的改变。所以说传统文化研究,也面临一个转型创新的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要重视与全社会共享,要注重它的社会传播;也要注重文化成果的品牌化,如能够形成文化品牌,将会更利于它的传播与影响;同时还要注意与互联网、纸媒体等的结合。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结合大学自身的特点来谈谈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弘扬传统文化是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完成的一个大的工程,大学在这方面当然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我们结合大学的实际、特点和优势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才是务实可行的态度和办法。

第一、大学的主要职责是培养人才,首先应该守住、守好课堂这个阵地。包括使课程体系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功能方面更加完善、教材里边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含量、课外即第二课堂也多一些引导等。

第二、在研究上要下大的功夫。这种研究应该是高层次的,要把传统文化里边深刻的一些思想理念、重要的一些人文精神、中国智慧等很好地进行挖掘,把它精华性的东西呈现出来。

第三、在国际交流上多发挥作用。大学里具有进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便利,可以通过相关学者的走出去和请进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能够更多更好地为国外所了解认识,最终达到认同这样一个目的。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著名作家)

就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这一话题,我想以汉代的做法为例,谈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汉代,特别是西汉,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两点相似。一是都存在亟需提升执政者文化水平的问题,二是都面对着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局面。汉代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两次文化灾难,使传统文化典籍焚毁殆尽,中国现代也经历了五四和文革等一些扬弃或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

西汉是在文化废墟上建立的国家,但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第一是大力征



集、整理、恢复文化典籍。第二是以“五经”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它不是把五经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更注重它实际的应用,把五经的思想理念贯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第三个是改良官员队伍,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汉代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学而优则仕”,在制度上体现为察举制,它的实质就是人才推荐制,即鼓励人们读书、读五经(后来发展为十三经)。这一制度和做法有效地在全社会树立起了一个观念,即你要做官得有文化修养,你要治国理政得用文化和智慧,而不是用权力。所以,汉代确保了国家官员是文化素质最高、文化自信心最强的一个队伍。汉代察举制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官吏选拔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选官制度。新中国建国已经快70年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条我们这个时代的行之有效,并能传之以后的公务员选拔、干部提拔模式,汉代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汉代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设置,在被秦朝破坏了的文化废墟上,修复了中国的文化生态,打通了中国文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代中国面临的处境和汉代很相似,汉代的做法和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借鉴,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

张艳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刚才穆涛先生谈到遥远的汉代,那么我想谈谈不太遥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至今对它还充满敬意。

《意见》里谈到的重点任务有一个是“大力加强文艺评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研究评论体系”。这句话我很有感触,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为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体系。我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当时的文艺评论氛围特别健康,而且有一大批人不遗余力也非功利地在投入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以陕西省为例,当时陕西省作协一批作家组成了一个叫作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文学团体,这个小组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场所,大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但为陕西文学走向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带动了陕西文学界良好的风气氛围。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评论不仅失去八十年代良好的争议氛围,而且在市场化、现实秩序的冲击下,急速地滑向世俗化,其中渗透了严重的商业气、市侩气和传媒气息,文学评论走上了友情赞助式的赞扬和自媒体时代中不负责任的抨击两个极端。

九十年代之后这种风气很让人痛心。现在中央出台《意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这很令人鼓舞,我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气和现象,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借鉴的。

### 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葛承雍(原文物出版社总编辑)

我今天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角度谈几点看法。

一、激活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冷静反思。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特殊历史处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社会背景、世界环境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思想激荡和观念的冲突都非常严重。这个背景下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我们既要充满自信,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难度和复杂性,这并不是把优秀传统文化说一说就能做到的问题,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首先需要甄别、梳理。中国文化储量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我觉得分清精华和糟粕是首要问题。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不优秀的,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需要辨别。我们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几千项,但是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是糟粕的东西,是封建迷信的,包括我们常说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优秀的”这一观点,也是有需要反思之处的。学术研究我认为它的任务首先是把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存正义、求大同等一些优秀的理念讲清楚、讲透。

第三、传统文化如何走出去,需要进行深刻地思考和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凭什么走出去?靠僵化的说教人家不喜欢,而那种浅层次的娱乐性的东西走出去能否承担起优秀文化传扬播撒、交流互鉴的重任?网络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手段,但它只是手段,不是内容,而关键性的东西则是内容。这些都是需要思考和反思的。我觉得研究界首先应该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好研究,让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都呈现在观众面前,让文化遗产中文字性的东西都活起来。但是怎么活、活到什么程度,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傅光(震旦汉唐研究院院长)

优秀传统文化,依我的理解,关键在优秀上,这个不难理解,我不必多谈。中央提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应当注意。第一个问题是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得知道哪些文化是优秀的,哪些文化是不优秀的。我们还需要把它的优秀之处用优秀的办法讲出来。我们很多人都在讲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讲的方法不优秀,没有办法把它的优秀之处呈现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优秀传统文化它要干什么。我们把优秀传统文化拿来是让它发挥优秀作用的。传统文化根本的作用,一个是务本(就是修身),另一个是致用。我们恰恰在这两头做得不够,比如,古典诗词是中化传统文化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不出它的好处来。唐诗的感染力在当时社会上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把它的感染力再现出来,那么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只是个客观存在,就无法作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个人理解,《意见》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阐释工作,要建立这方面的一个学术思想话语体系,二是教育工作,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就在于教育。

但这方面我们是面临一个难题的,即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化学术思想话语体系和教育学科体系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具有西方文化的体系性和内在逻辑。用这样一种学术话语体系阐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很困难,显得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以西方的体系为标准,那么实际上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基本上就被否定了。比如说西医和中医,按照西方的标准,西医是科学的,而中医就是不科学的,是迷信的。再如天文学,我们今天说的天文学这个概念,它是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代就没有天文学,只有星相学。

同样这样一种教育学科体系,也很难容纳、适应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为一个整体的独立体系,它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的内容,还包含一些经世之学像政治、经济、法律等以及科技之学的内容,这些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科体系,很难容纳得下这样一个整体性东西,要想融入这个学科体系,就得把它拆分开来。但拆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就被破坏了,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科体系在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务方面也是力不从心的。

这是一个是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又是我们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解决的题,需要认真探讨。

李利安(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教授)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形势恐怕在全球来讲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复杂局面,其原因应该说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同类型的文化面对面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区域、并肩存在、发生冲突,这样一个局势。

我们能不能抱着一个学术的、全球化的、客观理性的,准确把握未来发展命脉的这样一个态度,去

审视文化发展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形成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学界应该勇于去找问题,把那些优秀的挖掘出来,对不优秀的要进行批判,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得一定是权威性的。另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应承担一个任务,即对中华文化海外发展动态进行跟踪研究。我在澳洲等地看到,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其实很有兴趣,但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能不能寻找其中的问题,更好地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 四、西北大学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的责任与担当

**白阿莹**(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原陕西省副省长)

由于陕西省在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我有两点祝愿:一是祝愿“基地”能够依托陕西的历史文化遗存开展研究和工作,因为陕西省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是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性的内容的;二是祝愿它能占据陕西历史文化的顶级高度开展研究,能够出一批大师级的专家、出一批顶尖的成果,为全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增添光彩。

**董小龙**(陕西省高教工委书记)

《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全国各界文化建设的一个纲领,我就自己学习的体会认识和今天西北大学“基地”成立之事谈两点意见。

第一、大学本身就肩负有文化传承发展这样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次《意见》中又明确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贯穿到教育的全过程。所以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应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德树人这样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进一步在这方面做出大学应有的、更大的贡献。第二、大学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力度。陕西地区有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扎根这里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统、底蕴来展开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挖掘,这也是我们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我希望西北大学把“基地”不仅建设成为陕西省的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传承、发展的高端智库,也要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个智库来建设。

**王海波**(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对于西北大学“基地”的发展,我提几点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一是发挥资源优势。即汇集西北大学、陕西省的专家学者,同时也能走向省外、汇集全国的专家。二是凸显陕西特色。“基地”在研究中要体现陕西特色,有了陕西特色,才能够有中国特色。三是加强文化交流。文化交融交流非常重要,单靠一家机构闭门造车是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基地应既有省内的交流、同行的交流,也应走出去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交流,走出陕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基地把研究工作做得扎实,做出大的成效,多出精品力作,能够在全省甚至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何军**(陕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中央《意见》发布是在今年(2017年)一月,三月份陕西省召开实施《意见》文件的起草协调会议,西北大学“基地”则在2016年7月就开始了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申报工作。这说明其领导、专家团队是有眼光、有前瞻性的。由于西北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的雄厚实力,经过一系列评审程序,重点基地顺利获批。作为学术研究基地,希望它能围绕中央要求部署,紧贴陕西实际,开展高端研究,成为引领传统文化研究的先锋;希望它能出好的成果,力争发展成为国家级高端智库。

**王亚杰**(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中华民族今天到了一个走向复兴的伟大时刻,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它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应该说就是文化,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很丰富、博大精深,但是里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对待它们,把它优秀的内容发掘出来,传播开来。陕西历史文化的厚重,有目共睹,但我们如何使这些宝贵的财富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西北大学“基地”成立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好的平台,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让国内外大师级的文化研究领域学者能够来这里交流、研究,也给青年人才提供一个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研究、学习的平台。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愿意尽力朝这个方向努力。

郭立宏(西北大学校长、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主任)

对于“基地”成立的目的和思路,我简单介绍一下。一、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西北大学已经有不少与文化相关的研究机构,“基地”成立的目的在于去整合这些校内和校外的相关资源,形成合力。二、搭建平台。给校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平台,使其他各平台间能够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三、发挥后发优势。即总结以前研究机构的经验、教训,实现后发优势。四、高端性和高位运行。我们的定位是要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也要有高端性,建设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三位一体的高端文化研究机构。

李浩(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今天各位专家就对《意见》精神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贯彻实施以及“基地”如何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大量的很好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有观点的交锋。我觉得很好,这正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研究及传承发展优秀中华文化,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也应该有宽阔宽容的胸怀。只有这样才可能汲取各种有见地、有益处的意见观点,接纳各种肯定的和批评的声音,容纳各种有才华的人才;基地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我们才可能把优秀中国文化研究、传承、发展、创新的事业做好;我们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伟大工程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0日第8版,此次收录略有修改)

## ● 专家观点

# 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

楼宇烈

**摘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养成,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了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中国的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艺术中的音乐绝不仅仅是为满足人们的一种生理欲望,而是为了促使人们达到一种理想的人格。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作为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意识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境界表达,每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应该贯彻这种精神。美育的社会引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始终有一种体悟的精神贯穿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由艺入道相对比较容易。

**关键词:**艺术精神;礼乐教化;文化自觉;由艺入道

重视礼乐教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所在。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而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中国艺术注重表意,讲究体悟,要求艺术家在从事艺事之前应当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认识每种具体事物的本性,并建立起道德的自觉,这一点深刻传达了中国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

## 一、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人文的文化,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养成,主要通过传统礼乐教育。礼乐教育一方面讲的是“礼”,作为一种伦理的教育,体现出一种伦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教育,或者说是美育,体现出的是一种艺术的精神。艺术精神所包含的意义比一般的艺术教育或者艺术种类宽泛得多,它并不是指诗歌、绘画等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指体现艺术追求的境界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超越了具体艺术的一种精神。

可以说,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的精神与艺术的精神,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明分”,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即建立社会秩序。按照传统的说法,乐是用来“统同”“合群”的。社会是一个群体,用礼教将其分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级,明确各自不同的责任、权利、义务;同时又通过乐教使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一体。人们通过乐表达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国文化中的礼与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有高尚品德的人。过去常讲,中国历史文化是一种伦理的文化,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只看到了礼教而忽略了乐教。其实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视乐教的。古代社会看起来好像非常严肃且等级森严,其实它也是非常和谐的。因此,要



了解中国文化,如果不了解乐教,不知道中国文化是充满艺术精神的一种文化,那么这种了解就是不够全面的。

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一讲到艺术的文化,我们自然会想到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单从文学上讲,就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从音乐上讲,我们的音乐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传统艺术,还把外来的音乐、舞蹈都吸收进来,使之变得异常丰富。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有琴、棋、书、画。如果继续上溯,还有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御,都是艺术宝库中的精髓。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弹拨乐中最古老的一种乐器,到现在至少有 3000 年的历史了;与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相比,无论是从剧本的文学艺术、音乐演唱艺术,还是舞台表演艺术以及整个戏曲理论体系来讲,中国的昆曲都更胜一筹。希腊的悲剧早已消亡,只剩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印度的梵剧只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现代印度舞蹈中;日本能剧的历史比中国的昆曲要早几百年,但它从剧本到唱腔,再到表演艺术理论都没有昆曲那么完整和丰富。因此,昆曲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中保存较为广泛的。中国的昆曲、古琴已先后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艺术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其价值无法估量。

中国的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紧密结合,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经常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在根本上,道德的追求和艺术追求是完全融通、合二为一的。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把艺术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总之,中国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礼乐教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乐教从狭义上讲,是指音乐教育。中国古代讲的音乐包括诗歌、舞蹈在内,内容非常广泛。广义上讲,乐教指所有的艺术教育,或者美育。对于乐教,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主张通过“乐”完成对人的培养,把“乐”看作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古人把音乐教育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是最迅速、最深刻的感人方式,音乐可以移风易俗。《礼记》中的《乐记》是讲音乐的产生和音乐的社会功能,不仅指音乐这一门艺术,还包括了整个艺术教育。《乐记》首先考察了音乐是怎么产生的,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礼记·乐记》)就是说音乐是由人心所生的,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感情在心里发动,就用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声音并不等于音乐,还必须“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声音经过修饰编排之后叫作音。有了音还不是乐,必须“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礼记·乐记》),将音节联在一起,有了大小、高低、快慢变化才形成了乐。

乐是由音生成的,而“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音乐是感情的一种迸发。感情聚集后通过声表达出来,声经过修整之后变成音,音经过编排再成乐,乐就是这样产生的。“物之感人无穷”,人们每天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一个人的好恶没有节制的话,就难免会被物化。人如果被物化了,就成了“灭天理而穷人欲”了,必须要用正确的乐来引导、节制。因此,“乐”实际上是教化民众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是把礼乐和刑政放在同等地位来看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礼乐和刑政最终的目的完全一样。“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声音的道理跟政教是相通的。《乐记》中辨明了音乐的几个层次:第一层是“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即只知声不知音就跟禽兽一样;第二层是“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即普通人只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第三层是“唯君子为能知乐”,只有君子才能知道乐。《乐记》认为礼和乐是相互配合的,将“乐”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进行强调。同时,它还认为

音乐对人的感受力、震慑力是最为强大的,即:“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如果音乐教育进行得很好的话,那么人们会耳聪目明,血气也会和平,并且能移风易俗,这样天下就会达到一种安宁、和谐。

显然,在中国文化中,音乐绝不仅是为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而是使人们达到理想的人格。“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乐记》)，“道”即一种人格的境界,而“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礼记·乐记》)。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通过乐来引导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情操。形式固然重要,但只是停留在外在形式上,根本不是乐的本质。“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礼记·乐记》),乐并不是指奏响黄钟大吕,唱歌、跳舞都是音乐的末节。其实,此类思想孔子也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真正的乐教,或者说艺术的精神,是通过外在形式寻求人生最高的境界。音乐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品德与德行,而不是培养人的艺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礼记·乐记》)。德行是最高、最重要的,而艺事是其次的。艺术不是一种竞技性、表演性的活动,六艺“诗、书、礼、乐、射、御”中,“射”跟“御”实际是体育活动,但其本质不是竞技性、表演性的,而是要通过艺术、体育等活动来陶冶性情,以寻求人生更高境界。《乐记》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把艺事放在第二位。通过艺术,人们追求人生的根本道理。陶冶情操,提升人生境界需要由艺人道,同时要用道来统摄艺,这应该是中国乐教中最根本的精神。

## 二、中国艺术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功能

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作为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意识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境界表达,每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应贯彻这种精神。可以说,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艺术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有人提出,中国没有艺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或者是政治意义,而没有凸显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因此,近代以来很多人都在探讨所谓艺术的自觉。他们认为,艺术的自觉就是艺术能够脱离政治,只反映艺术家的个人追求。或者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说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不去管其内容对大众究竟是有利还是无利,只有这样艺术才是自觉。这是一种误导,现在很多美学研究、艺术研究,都把“什么叫作艺术的自觉”作为重点讨论的问题。

就中国历史发展而言,很多研究者认为,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的艺术才开始进入艺术的自觉,因为魏晋时期强调人个性的张扬,强调尊重自然,与先秦两汉以来强调乐教要服从于伦理的原则、服从于治国的理念、服从于人格境界的提升相比,艺术好像完全成了人自然个性的充分表露。其实,这里也存在一个误区。魏晋时期,确实强调人的个性,强调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要解决人的自然本性与整个社会礼教的要求与束缚,产生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成等非常强调狂放、放任。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批人之所以这么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为躲避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通过表面的狂妄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内心并非真正是放任的,相反,他们是非常重视礼乐规范的。譬如,阮籍虽然非常狂放,但教育儿子决不能学习自己的放荡不羁。嵇康虽放任却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养生论》中说,完全放任自己最后会害了自己。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家们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必须要有鲜明的社会伦理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艺术的这种定位,对于艺术和人格培养之间关系的诠释是非常重要的与准确的。每位艺术家都应具备非常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很难讲社会风气会被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是非常可怕的。之所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现代社会在乐教方面实际上是相当放任的,对社

会造成的影响也很坏。现在有些艺术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因此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乐教,或者艺术教育、美育教育的看法,对现代人而言非常重要。

美育的社会引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西方文化通过宗教进行道德教化和艺术教化,西方艺术中有 90% 都涉及宗教艺术,礼乐的教化大都通过宗教进行。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形式,如果我们抽掉关于做人的道理和人际关系的教化,而仅仅去学习西方近现代以来所谓张扬个性的表达,就会失去自己的根本。在根本问题上,西方宗教规定的伦理道德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是西方的道德防线。除去现象上个性张扬的表达之外,西方还有非常传统与深入的宗教教化。而中国如果抛弃自己的礼乐教化,去学习西方的张扬、放任,但又没有西方那种宗教教化,就会失去自己的道德防线,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的许多艺术曾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譬如以前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对做人道理的学习大多通过艺术教化完成,说书、演戏等都给了他们学习做人的途径。尽管老百姓大多不识字,但对于做人道理的把握,可能比那些识很多字、有很高文化的人还要准确。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是非常强调艺术修养的。艺术创作者要在作品中寄托志向、人格,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艺术接受者要从作品中体会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人们对于好的诗篇和散文常评价为“脍炙人口”,因为好的作品不仅辞章华美,更重要的是寓意深刻。宋代学者周敦颐的《爱莲说》,虽然很短但其中的寓意却非常深刻。通过对牡丹、菊花、莲花的比较突出了三种花的品格,更凸现了喜爱这三种花的人的不同追求。中国古代散文中,《岳阳楼记》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其中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这样的名句,不仅辞藻优美,而且含义深刻。对联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未出土时就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描写的是竹子,非常贴切。从中可以体会到做人的道理,人应该像竹子一样,要有节操,就算到了再高的地位,也还要虚心,要谦逊有礼。艺术精神就是这样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因为在艺术精神中包含着社会责任——文以载道,艺术不只是为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用来教化民众、和谐社会、休养生息、陶冶情操。因此,不能玩物丧志、好恶无节,而应当通过艺术提升修养,通过文以载道、以道来统艺,提升欣赏趣味、审美境界,进而体悟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在人生修养或者文化修养中不仅要有伦理修养,而且一定要包含艺术修养。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现在的艺术教育特别是所谓课余的艺术教育,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功利性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不仅不能起到陶冶性情、体悟人生的作用,反而会助长、滋生功利心。因此,如何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正确把握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涵,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三、中国艺术的美学意蕴与生命体悟

中国艺术强调社会功能,这是从艺术及与其社会功能的关系来讲的。从艺术本身的特征来讲,应该说中国艺术更强调表意,而不强调形式。孔子讲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其中更为强调音乐的内容。这种注重表意的特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得到了理论支撑。而该理论支撑源于玄学家,他们在解释《周易》时归纳总结出来的。笔者认为,两汉注重《周易》的象数,而魏晋玄学注重《周易》的义理。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得意忘言。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

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其实,卦象也好,彖辞、卦辞也好,爻辞也好,都只是表意的工具。人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去掌握意,而不是停留在象和言上。我们的目的是得意,得意以后可以忘言,也可以忘象。只有真正忘掉象和言才能得到意,而“言外之意”是庄子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玄学以周易老庄作为最基本的依据,《庄子》中讲工具和目标的关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王弼也用庄子的该观点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关系:“故言者所以明象,犹蹄者所以在兔,筌者所以在鱼,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也。”这就形成了中国思想中强调获得意义是第一位的特点。而获得意义并不是一定的,它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会去把握的。汉代董仲舒就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也就是说,《诗经》是可以由每个人自己去体会的。《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有人认为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而理学家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男女爱情,还蕴含着“后妃之德”。这种“《诗》无达诂”的精神就等于得意忘言。把握一个意思而不只停留在语言上,这形成了中国艺术非常重要的特点——文以载道,创作者在其作品里寄托个人的志向、追求、理念或者理想。欣赏者也可以通过作品体会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其并不一定还原到作者想要寄托的原意。也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考据问题,而是体悟问题。因此,就中国艺术来讲,创作者有创作,欣赏者同时还有创作。现在人们对于一些内容的理解可能已经完全离开了其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例如,从诗本身来讲,《登鹳雀楼》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一次实时实地的描述。王之涣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说是即景而生。但后人欣赏完全脱离即景,将其中的“意”抽出来。特别是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引申、发挥出更深层的寓意。

中国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双重创作,强调内涵而不看重外在形式。创作是以立意、传神、韵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如果只是形似而不能传神的话,那就不是上品。而欣赏要得意、会心、体悟、回味无穷。如果只是看一看这幅画表面上像或不像,就没有意义。苏轼曾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新画折枝二首》)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要谈论画,不能从外形、外表来看它像不像某个东西。如果只追求外在形似,就跟孩子的见识一样了。如果一首诗表达的东西,欣赏者却领会不到言外之意的话,那他一定是不懂诗的人。苏轼的话很有代表性。欧阳修也说过类似的话:“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盘车图诗》)艺术到了高妙之处是无法言谈的,完全靠个人的体悟。

欧阳修认为,应该这样欣赏梅圣俞的诗:“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盛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于意,不可得而言也。”(《书梅圣俞稿后》)他用音乐比喻诗,从创作者和欣赏者角度来讨论。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讲的是心灵之间的沟通,一个是得于心而应于手,一个是得于心而会于意,都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跟西方艺术理论或者原则,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有一种体悟的精神贯穿在艺术的各个方面。譬如古琴,它是礼乐教化中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一种乐器,“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因为琴或者瑟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陶渊明认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列传第六十四》)只要能够把握琴中的意趣,又何必非要弹出声音来呢?很多东西是需要个人来体会,并在体会中把握的。中国文人强调琴棋书画,而琴是排在第一位的。东汉时有部文献叫作《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是汉章帝召集的一次会议的记录,是将儒家的治国和人生修养的理念规范化、制度化的一部文献。这部文献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关

系都有规范,对礼乐教化的功能也有说明:“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含有禁、禁止的意思,它能禁止人的邪念,使其归于正道。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对于琴的作用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汉代著名学者蔡邕讲:“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操》)“反其天真”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回到它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琴是用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防止其流于邪淫,是用来修身养性的。一直到近代,对于琴的基本认识都是这样。同样,其他的音乐形式也都起这样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非常重视效法自然,不仅仅是效法自然界多姿多彩的山水草木,更多的是效法自然界所呈现出来的本然状态,因此,自己内心对于人生和生命的体验就更加强烈了。《画论》中论述:“万事造画,终得心。”要做好一门艺术,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北宋著名画论者郭若虚认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图画见闻志》)我们看古代各种各样的画,创作者都是一时的才俊,或者是隐居在山林里的高士,而且这些人都是“依仁游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志于道”,要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据于德”的“德”意思就是得到,天的本性是天道,从天道那里得到事物具体的本性,就叫作“德”。道是一个总体的、自然的本性,德则是每个具体事物的本性。“依于仁”,要建立起一个道德的自觉。最后才能“游于艺”,即从事种种的艺术行为。中国古代的“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狭义的艺术,是包括所有的技艺在内,指艺事。“道”和“艺”是相对的,“道”讲的是总的原则,而“艺”讲每件具体的事情。“游于艺”指所从事的所有事情,而在此之前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郭若虚强调,不管是社会才俊还是远离社会的隐士,都是依仁游艺,都是“探赜钩深”的。所谓“探赜钩深”就是探求宇宙自然的道理,探求人生的道理,他们把这种高雅之情“一寄于画”。而如何才能达到气韵生动?首先要看人品,人品已经很高了,气韵就会随之增高;气韵既然已增高了,生动自然就有了。所以,气韵生动不是光靠技术就可以得来的,关键是看人品修养,也就是欧阳修讲的“得于心”。得于心才能够应于手,人品是最重要的。

近代著名画家陈衡恪讲到文人画时,就指出了文人画的特质。他认为,文人画有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情。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它不是把技巧、技术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作者的人品、见地、思想、学问放在第一位,并非从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夫,而是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意义来。中国艺术的这些特点与其强调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理论上也得到了“得意忘言”这种思维方法的支撑。言外之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可以说体现在各个方面。譬如读书,书读得多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聪明,还要看他是否能从书本里跳出来。得意忘言,就是要求不但要进得去,更重要的是出得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书本内在的精神和要点。

中国人强调不能停留在文字上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都是在文字上面下功夫,大多通过文字来分析。而中国恰恰要求个人透过文字去把握内在的意义、要领或者精神。禅宗六祖惠能为法达说《法华经》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一点。法达禅师自小开始诵读《法华经》,却始终不能参透其中要领,参见六祖惠能时,“念《法华经》已及三干部”。惠能大师指出其犯了“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的过失,并作一偈,其中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久不明己,与义作雠家。”惠能大师说,你虽然诵了 30 年《法华经》,但不得要领,是被《法华经》转了,你应当辍《法华经》,不要被它的文字所束缚,要通过字面去把握它的根本精神。法达一听,恍然大悟,以偈赞颂说:“经诵三干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从此领悟了《法华经》与禅宗的精髓,



不再执着于文句,同时“亦不辍诵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中国的艺术品才能够反复被欣赏与体会,领悟其中的道理。同样是一幅画,用不同的心情去欣赏,会有不同的体会;不同年龄的人去欣赏,又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因此,艺术的生命力是恒久的。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使得每件艺术品的生命得以永恒,可以随时随地给欣赏者全新的体验,实际上也是重新创作的机会。

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述而不作”的传承方式来思考,会得到相同的启示。中国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传统经典的不断阐述来发展创造的。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就是“三玄、四书、五经”。其中,“三玄”和“五经”中的《易》相重,《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归并之后实际上有9部根源性典籍。根据这9部书,后人又阐发出很多道理,而这众多的道理又可以统领到这9部典籍中去。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化,既是一散为千方的,同时又是百用而归一的。如果被经典束缚,思想就会止步不前;如果领会了,就能从这些经典中翻造出无数新的思想。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造,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创造。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进行不断反复的研究中才会出来更多的新意。现在主张原创性,其实离开传统的创新是不能长久存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不断去阐释、欣赏。如果离开传统这片土壤,根本不会长出创造的新芽,佛教《百喻经》中“空中楼阁”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同样,如果抛弃了中国文化中的这些传统,不但得不到楼阁,中国艺术也会因此而消亡。

中国的传统艺术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这不仅是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也包括艺术自身的特点。通过艺术教育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才能体会人生、体验生命。中国艺术强调经营布置,即将各种关系处理好,有无虚实、刚柔动静、远近疏密、轻重浓淡、高低缓急等都要处理好。不要以为把画布画满才漂亮,有的时候空着恰恰是最好的。《琵琶行》中“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声音其实也是一个音节,更有别样的效果。清代画家汤贻汾曾论述:“人但知有画处是画,不知无画处皆画。画之空处全局所关,即虚实相生法。”(《画鉴折览》)人只知道有画的地方是画,不知道没画的地方处处都是画。往往画中空的地方才是全局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虚实相生。把所有的格局、虚实、浓淡都布置得当,达到和谐,才是好的艺术。通过这些艺术思想,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因此,艺术的修养不仅使一个人懂得艺术,更重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智慧的人。通过一个人的艺术欣赏趣味,往往可以看出其人品的高下、做事能力的高低。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礼乐教化的精神,这些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现在整个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人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道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道理,很难理解,而由艺人道就相对比较容易。很多人都喜欢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读诗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诗的本身,还要看一些诗论、词话来弄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诗词是这样表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是十分有帮助的。

(本文原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作者楼宇烈先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宗教学与东方哲学学者)

## 在创新中传承 在传承中创新

党圣元

丁酉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时间点的选择,传递出一个强烈的文化愿望,那就是:正如春节带着吉祥与喜庆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的生活中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带着自身的尊贵与光泽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更应该以文化自信、返本开新的信念珍爱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发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意义,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方针。《意见》正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概括提炼而出,立意高远、内容丰赡、系统全面、逻辑严谨,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文化思想,以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方略。

《意见》由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厘分为 18 条,从体与用两个层面阐明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思想意义、现实作用、实施方略,着眼点就是在于保护、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诠释、传播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新的生长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主要依据,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力量之一。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行进迫切需要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力量予以有力的支持与驱动,迫切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用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丰厚滋养。

《意见》所传递的文化信息非常明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亦即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则是其主旨所在。核心实质就是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敬畏传统并勇于创新为姿态的,既充分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与世界先进文化相通声气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必须能够对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作出价值方面的界定和规范,必须能够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文化规范约束的作用。《意见》在总体目标中所提出的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体系,正是基于此而提出来的。作为一个体系建构,包括理论纲领和行动准则两个层面,由一系列具体的思想准则、理论方法、建构框架、实施措施组成,这一点在《意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在《意见》的指导下,通过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应对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新形态的文化体系形态必将形成。

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要与时代主题相融合。关于这一点,《意见》进行了充分的具有理论深度的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一个魂牵梦萦的期盼,始终是历史与现实交汇互融的一个大命题。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常青的光荣与梦想,一旦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民族复兴也好,国家兴盛也好,便是无本之木。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的融合,而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实现伟大复兴需要着力汲取和挖掘的重要思想资源宝库。在传承的基础上智慧灵活、大气磅礴地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文化领域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须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意见》更是作出了充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并随历史的发展而变迁。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很多时候被视为一个贬义词,每当需要之时便把“传统”拉出来声讨、鞭笞一番,让其充当“现实”的替罪羊,从而使社会逐渐失去了对传统的敬畏、信心。更有甚者,一部分人主张全盘“西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抛弃、埋葬传统文化,完全推行西方文化。这种文化思潮一直存在,并且成为一部分国人随心所欲地蔑视中国历史、欺凌传统文化的文化认知心理倾向。近年来,面对中国强劲崛起这一鲜活的社会现实,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的呈现,文化虚无主义越来越失去话语空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越来越清晰化,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正处于一个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意义再发现、再转化、再运用的时代。但是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意义呈现和资源价值利用,具有非整体性的特点,其中既有具普适性的精华成分,又有属糟粕性的东西;既有合时宜的,亦有不合时宜的。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要汲取哪些内容,摒弃哪些方面,应当心中有数。如果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态度,对其没有一个客观辩证的认识,便无法建立起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与机制。

如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新的生长点,从而在传承的过程中得到创新性的发展,对此,《意见》也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路径与措施,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新形态,具有重要的育化作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目的、方向、任务方面都是一致的,处于同一个思想与实践过程。在顶层文化设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无不反映出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与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坚信,通过对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的持久不懈的贯彻落实,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一定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开辟出一番新的境界。

(本文原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10日第3版。作者党圣元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著名文艺理论专家、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 ● 学术平台巡礼

#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 学院简介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是在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基础上于 2014 年 1 月正式挂牌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实体性丝绸之路研究机构,设立了丝绸之路战略研究中心、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丝绸之路文明交往研究中心、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在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问题、文明交往等领域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和成果积累。



### 研究活动

丝绸之路研究院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致力于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提供学术思想支持;为丝绸之路研究英才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与丝路各国相关机构加强合作,为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先后与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外交部国际经济司、陕西省发改委等单位建立起定期会务联络机制,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广播电视台、五洲传媒、黑龙江出版社等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致力于宣传中国政策、倡议,传播中国声音;开展联合研究,为国引智。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韩国、印度等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建立合作关系,并主办承办“文明对话·长安论坛”等大型学术会议,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 团队与成果

院内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10 名,国内外兼职研究员 60 余名。其中包括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原院长白永秀教授、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艺术学院岳钰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山冰教授、李海波教授等。目前,累计申请和获批 16 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专职研究人员发表 110 余篇学术论文。

主要专著有:

(1)李海波教授的《死亡学视域中的佛教研究》,从中国传统看待死亡、处理死亡事件入手,结合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佛教死亡观的各个主要层面及对华夏死亡文化的影响。2007 年作为《西部人文丛书》之一首版发行。2013 年作为人民联盟文库的百部优秀作品之一再版,2016 年入选《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丛





书》，发行法文版。2012 年 7 月获第 9 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 席会东副教授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采用专题图分类模式，以地图的绘制、运用为主线，解析海内外十余家收藏机构所藏的 200 余幅中国古代地图的源流与内容、绘制与运用、流传与收藏，阐释中国古代地图的思想文化内涵，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的地图文化遗产，全面叙述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2013 年出版。2015 年 2 月获中国出版协会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2015 年 5 月，获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7 年 1 月，获西安市人民政府“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 王静副教授的《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内地与边境、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中国与外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关系以及中国古代处理这些关系的观念基础等。2002 年出版。

(4) 赵斌副教授的《13—14 世纪关中社会生活》(第一作者)，通过全面梳理蒙元关中社会生活资料，不仅宏观地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也从微观的角度揭示出蒙元关中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和规律特点，并最终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中的地位与影响。2016 年出版。

已编辑院刊《丝绸之路通讯》(半年刊)6 期。正在策划系列丛书包括《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丛书》和《当代丝绸之路丛书》，两套 44 本，目前已编辑完成 10 本，提交三联出版社。

